

四川省三台县东汉崖墓

[美] Susan N.Erickson 著

夏笑容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钟 治 (绵阳市博物馆) 译

王 毅 (三台县文化馆)

摘要：崖墓是东汉时期四川地区一种非常流行的墓葬形式。郪江流域的崖墓数量众多，形制多样，特点突出，是四川崖墓中的单独区域。郪江崖墓的大中型墓葬内大多都雕刻有丰富的仿木结构建筑形式和画像装饰，有的雕刻上彩绘依然保存完好。本文将对这些崖墓中流行的仿木结构建筑形式以及墓室壁上的画像雕刻和彩绘装饰的内容、涵义进行解释和探讨。

关键词：三台；东汉；崖墓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2-0055-13

译者按：本文译自美国密歇根大学迪尔本分校 Susan N.Erickson 教授发表在《东亚考古》2003 年第五卷的 Eastern Han Dynasty Cliff Tombs of Santai Xian, Sichuan Province, Koninklijke Brill NV 编辑出版。作者在对四川三台郪江崖墓群进行实地考察后，通过对其基本特征、建筑结构和画像石刻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形成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观点新颖独特，是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新认识。现将该文译出，以便读者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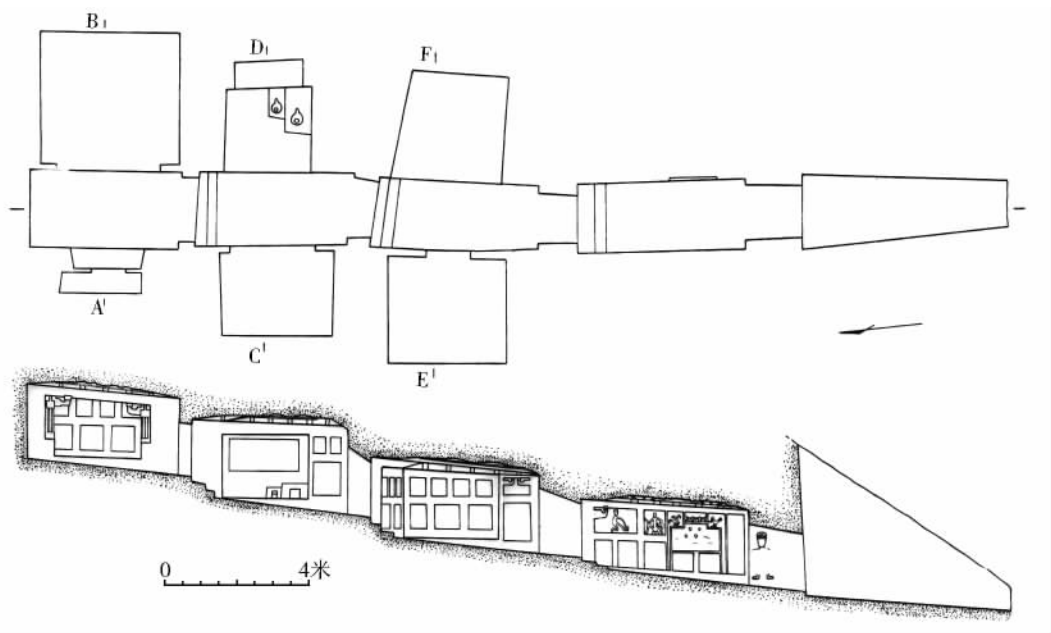
一、基本特征

三台崖墓是四川省东汉时期 (AD25—220) 崖墓的典型代表。自从二十世纪早期被西方学者公布后 (Torrance 1910 和 1930-1931; Ségalen 1915 和 1917; Ségalen et al. 1923; Bishop 1926; Bedford 1937; 以及 Edwards 1954; 一个早期的综述, 见 Baber 1882), 四川其他地区包括乐山和彭山地区的崖墓就广为人知。罗二虎把四川崖墓的分布划分成三个地理区域: 成都平原、乐山所在的岷江下游流域和涪江中游流域 (罗 1988b: 163)。本文主要研究涪江流域的三台县北部区域 (南溪镇) 以及沿郪江和锦江的三台县

南部区域 (安居镇)。这些墓葬既体现了四川地区东汉崖墓的共同特征, 同时又极具自身特点, 如保存精美的壁画、彩绘画像石刻以及与众不同的仿木结构建筑形式雕刻等。

三台崖墓均开凿在沿河的砂岩山坡上。正如四川其他地方一样, 这些崖墓均成群地相间分层分布在山丘从山脚至山腰以上的部位。遗憾的是, 大部分崖墓的随葬品在很久以前就被盗掘, 极少数墓葬因埋葬条件较好, 积土较厚, 墓道与墓门不易发现而得以幸免。现在, 发现的很多崖墓, 尽管随葬品大多已经荡然无存, 但墓葬形制结构、附属设施以及墓内仿木结构建筑形式和画像雕刻等保存情况较好。三台地区崖墓的年代从东汉早期一直延续到东汉晚期, 还有一些甚至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台县北部永明元宝山崖墓群 1 号墓, 前室纪年题刻显示的是东汉顺帝刘保“永和”年号, 即公元 136~141 年 (景竹友 1997: 69; 孙华的年代分析见 1998: 373-375)。

三台崖墓的形制多样, 有些是单室, 如金山 5 号墓, 进深只有几米, 现被村民辟作红薯窖; 有些是多室墓, 进深却很深, 如坟台嘴 1 号墓 (图一), 全长 27.3 米 (三台 2002: 19), 是



图一 坟台嘴一号墓平、剖面图

三台地区已发掘崖墓中结构最为复杂的墓葬之一。它由墓道、墓门、甬道、4个墓室、5个侧室和1个耳室组成。后室与墓门间斜坡高差达4.3米，墓室底部皆由里向外倾斜，墓室间都施三级台阶相连，利于墓室内排水，因此该墓保存较好。这种斜坡式踏道墓结构是三台崖墓的特点之一。墓葬的排水确实是一个难题，有些墓葬中，水通过砂岩的裂隙渗透下来，在墓室顶部和室壁上都留下许多钙沉积物。

崖墓并非首先在四川地区出现。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中国东部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崖墓。最早的一座是位于河北省满城的刘胜及其夫人的墓葬。刘胜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封为中山王。刘胜墓由多个墓室组成，由石灰岩山体的一侧水平向内开凿而成。刘胜墓外形类似于一个地道，但是崖洞内的多墓室的布局却俨然一座宅院（巫鸿1995:130-133）。发掘者认为在主室中应该存在过木质结构，现在木头已经腐朽了，但是瓦和相应的金属构件却保存了下来。石门、墙和屋顶等附属结构的存在也使得后室看起来像生活居室。在东汉时期，这种墓室布局模仿墓主生前生活宅第即视死如生的观念得以流传下来。在巴蜀地区，便与当地特色结合创

造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

二、建筑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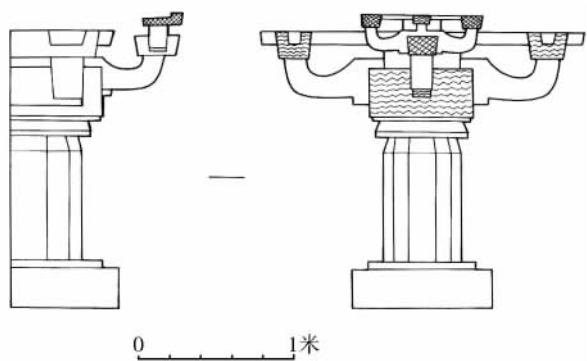
特殊建筑结构的存在使得四川地区的崖墓看起来更像是生活宅第，而并非仅仅只是一个深邃的山洞。刘胜墓在开凿的山洞内搭建墓室，而四川地区的崖墓则是在岩洞的壁和顶上雕刻各种建筑构件^[1]。另外，有些墓还将墓门雕凿成面阔一间的单檐建筑形式，屋檐较短，屋面和檐口雕刻细腻。金钟山2号墓墓门屋顶是由带斗拱结构的立柱承托，屋面瓦垄和檐口瓦当雕刻非常逼真。斗，或叫方形木块；拱，或称弓形支架，是建筑物柱与屋顶间的过渡部分，用于承受上部支出的屋檐，将其重量直接或间接地转到柱上。但是在这些崖墓中，它们只是高浮雕的装饰，并不真正起到承重的作用。

墓壁一般雕刻成仿木结构的木板墙或编壁墙。立柱构成墓壁的外框架，而横梁则把这个框架水平分割。壁柱把横梁分成一个个的方形区域。如果现实生活要建造这种墙，则需要在木框架中间的区域安装薄木板或用竹片编织成筋骨后再双面涂抹黄泥。有些墓葬的仿木结构上涂有红色或是深蓝色的颜料。然而有少量崖墓室壁仅用

彩绘的手法表现这些墙壁结构,而不用浮雕雕刻。在东汉同时代的四川其他地区浮雕中也能见到这种仿木建筑结构风格。如成都附近的曾家包就发现了很好的一例。此墓后室墓壁上雕刻了一座房屋,房屋的右边有与三台崖墓中特征类似的仿木结构。这种有外凸木构架的墙壁建筑技术今天在崖墓所在山脚村庄中的传统建筑中仍能见到。

坟台嘴1号墓则表现了一套现实生活中的附属建筑构件及生活设施。例如,中室与其右侧室之间的入口处两端各有栏杆状坎墙一段和骑墙柱一根,柱顶斗拱。四川东汉时期墓葬出土的多件小房屋模型中也存在同样的建筑结构。类似的结构在河南洛阳郊区的一座王莽时期(公元8~23年)的砖室墓也有发现。这座墓是在偃师新村发现的,如三台的侧室一样也用栏杆状坎墙来表现墓室内的各个房间。

与四川其他地方的崖墓相比三台崖墓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发现了各式各样的斗拱,墓室内的大部分斗拱都是承托室壁额枋。这些斗拱通常是高浮雕,有的表面饰彩,与墙壁其他部分相比更显眼。有的立柱位于墓室中央,柱上斗拱直接承托室顶,其中最复杂一例是胡家湾1号墓后室的十二棱柱斗口跳斗拱(图二),此墓的年代尚未最终确定,可能属于东汉中期(杨存贵、钟治2000年)。都柱为十一边形,置于柱础之上。柱顶斗口跳斗拱拱子向栌斗前面和左右两侧三个方向伸出承散斗,前方的拱子(相当于后世的华拱)再出令拱托室顶天花枋。柱顶栌斗和斗口跳斗拱以及令拱的齐心斗的轮廓均用墨线勾



图二 胡家湾一号墓后室立柱斗拱

勒,栌斗和散斗正面均绘有菱形方格纹。第二个例子是柏林坡1号墓,斗拱结构稍微简单点,但是都柱被切成十六边形,都柱和斗拱上均施红彩,整个构造非常引人注目。

部分崖墓雕凿有模仿生活用的家具。例如,许多三台崖墓的墓口就常有依原岩一体凿成的炉子。手提式陶炉在秦汉墓葬中很常见,但是直接就岩石凿成火炉却是四川崖墓的特色。类似这样的家庭必备生活用具在墓葬中出现,进一步证实了古人把墓室等同生活宅第的观念的存在^[2]。我们在三台崖墓中还发现有另一类特殊的家具,是一种就原岩一体凿成的躺椅或床。在另一些崖墓中,墓室内壁有浮雕的门,似乎在暗示人们屋里有更多的房间。在金钟山区1号墓墓室的后壁上,雕着一个从门内探身张望的人,此墓墓门右侧同样雕了一扇更小的门,此处,没有探身张望的人物,但是门是半开的,同样暗示了这是个通道。半掩门的画像题材作为墓室墙壁装饰的一部分和石棺上的浮雕画像,在四川其他地区的许多东汉时期崖墓中都有发现。在中国的墓葬建筑中,这是一种历久不衰的题材,但是关于这种题材的解释,汉代文献中却从未提到^[3]。在金钟山

1号墓中,这个形象似乎在期待一个人的到来,然而四川其他地区的几例中,我们能很明显看出门后的这个形象并不是人。在芦山发现的一个石棺的后端,这个形象有一只小翅膀,一条长有鳞片的腿,头顶有两只耳朵,根据碑文记载这个墓葬年代为公元221年,荣经县也出土有此类题材的石雕(见Lim1987:图38)。大耳和翅膀是不死(永生)的象征^[4]。虽然并不是门边的每一个这样的形象都有可描述的特征,但是它们似乎都暗示着某人的身体或灵魂将从这里经过,并到达另一个世界。这种题材在三台新德乡的一个崖墓中出土的陶灯座以及绵阳附近出土的摇钱树座(绵阳2000,彩版3.4)上都有发现,使得这种目的更为显而易见。灯座和摇钱树座的上部形象都是西王母(汉代一个重要的代表着永生和仙界的女神)。她坐于龙虎座上,她的王座下面是一扇开着的门,两边均有侍卫把守。门也是虚掩着,也许是通向西王母仙界的通道入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门就与四川一些墓葬,包括简阳一个石棺和巫山县发现的一些镀金铜牌饰中提到的

天门有关。

最后要提到的是天花的装饰,它可能同时也是三台崖墓建筑构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般主过厅的天花微向上弧,这与四川其他地区的情形是一致的。但三台崖墓的天花会进一步装饰仿木结构。金钟山 4 号墓中,中央浮雕一根梁枋,两侧对称施以椽桷,外观似两面坡屋顶。有时结构更为复杂,天花中心有天花枋一周,四周连着短椽桷,有时天花枋内会装饰叠涩式斗四藻井一方^[5]。藻井的最顶端一般是平的,有些会装饰浮雕和彩绘。东汉文献中曾提到类似的结构,叫藻井或水生植物井(aquatic plant well)。在《西京赋》中,张衡(公元 78-139 年)提到在西汉都城长安未央宫中有这种构造(《文选·西京赋》38 (2.5a), 翻译本: Knechtges 1982: 187-188, 100-103)。

亘雄虹之长梁,
结棼橰以相接。
蒂倒茄于藻井,
披红葩之狎猎

虽然没有张衡赋中所描写的这般宏伟壮观,但在三台县的许多崖墓的主室和侧室中都雕刻有藻井。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汉宫藻井中的垂莲图案,在后面我们将予以介绍。首先要介绍的是一对更为常见的图案,浮雕或彩绘于藻井中的日和月。其中保存较完美的一例是在三台县元宝山二号墓的前室中发现的(景竹友 1997)^[6]。整个四川境内的汉墓中,日、月画像并不少见,但是最典型的一例出现在彭县作为墓室装饰一部分的画像砖上(常任侠 1988, 172 页)。这些日神、月神的图案上出现了一些象征物,太阳图案的中心有一只展翅的鸟,而在月亮图案的中心绘有一只蟾蜍和一棵桂树。

与常发现于墓砖和石棺上相比,在三台崖墓天花上发现的日和月的画像题材更表明其与河南地区,尤其是洛阳郊区的早于东汉时期的墓葬有更密切的联系。这个地区西汉晚期的空心砖墓的天花板装饰同样以太阳和满月的组合图案为特色,而且也是由它们特有的象征物来识别。在卜千秋墓中(公元前 1 世纪),太阳涂朱色,内有只黑鸟,月亮内绘蟾蜍和桂树(黄明兰、郭银强 1996: 61-76, 孙作云 1997)。它们是一幅长组

合壁画的一部分,另外还包括青龙和腾云驾雾可能正飞向天堂的墓主人,这类“升仙图”题材在汉代文学和艺术作品中都非常流行。墓中太阳和月亮这些意象一定是与死者灵魂向往之处有关系的。卜千秋墓的墓顶是由一排排的砖砌成,日、月图案分别绘于不同的砖上,各自为一幅独立的画像^[7]。洛阳郊区金谷园王莽时期(公元 8-23 年)墓葬,后室顶部的图案与三台崖墓中的藻井图案更为相似(黄明兰、郭引强 1996: 105-120; 洛阳 1985)。这些画都绘在不同的墓砖上,太阳和月亮绘于分层藻井的中心。彩绘建筑结构在金谷园前室墙壁和后室高浮雕梁柱结构上的运用,则让我们看到了其与前文讨论的三台崖墓的另一种关联。

当然,三台崖墓中也发现了一些洛阳墓葬中未曾出现过的题材,这些题材可以看成是地方特色。有的壁板上装饰一种发掘简报称为“瓜”的东西。瓜可以解读成甜瓜,同时也可以理解为葫芦、西葫芦、黄瓜、南瓜。这种瓜悬挂在壁板中央,与前面引用的张衡描述的长安未央宫藻井中的莲花很相似。坟台嘴 22 号墓中,悬在覆斗状内凹藻井内的“瓜”,表面雕刻有数道“瓜棱”,每道棱沟还经朱红彩绘。有时墓中的一些房屋模型上也有这种特色装饰。例如,忠县涂井出土的房屋模型中,一些瓜挂在其一楼中心柱的斗拱上,也有的挂在二楼边柱的斗拱上(见 Bagley 2001: 263, 图 8)^[8]。

这种鲜红的“植物果实”有可能纯粹只是一种装饰,但是它极可能有更丰富的涵义。《山海经》中有类似物品的描述^[9]。根据文中记载,峨嵋山顶峰的一种丹木就结与瓜类似的果实,表皮为红色,叶脉为黑色,据说可以用来治黄疸病,也可以防火。对于被墓葬中仿木结构所模仿的汉同时代的木结构房屋来说,火是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这样一个寓意吉祥的瓜也就显得非常必要。另外一种可能的寓意是瓜有大量的籽,其中可能隐喻着人们多子多孙的愿望。我对四川地区东汉崖墓最初的调查显示,仅在绵阳和中江附近地区的崖墓中有这种特殊的瓜悬挂于墓顶(何志国 1988: 224, 图 7.1-2; 黄崇华 1989; 王启鹏、王孔智 1989)。四川省外也有一些例子,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一号墓的藻井中央就有类似的

瓜(南京1957)^[10]。其周围环绕着身躯舞动的龙,暗示藻井的周围是水。

如果这种植物果实的功能可以确信是防火,那它可能还与宫殿建筑中藻井的另外一个装饰有关——莲花或另一种类似的水生植物。确实,在邻县绵阳一座墓中,墓顶枋椽上同时雕刻有垂瓜和垂莲(何志国1988)。在三台县的一些崖墓中同样流行与水相关的高浮雕题材装饰藻井的枋椽。比如,坟台嘴1号墓藻井四周的枋椽上浮雕有一个瓜和两只龟。

虽然三台崖墓的藻井中央并没有出现“垂莲”题材,但在四川省外,许多东汉末期墓葬的藻井中雕刻了垂莲。Marylin Rhie指出藻井中这种题材在中国应用非常广泛,从西部地区甘肃武威雷台至中部地区河南密县打虎亭再到东部山东省沂南均能见到(Rhie 1999:图64)^[11]。但是在四川,莲花这种题材更常见的应用是在墓葬的其他部分,墓葬中的房屋模型内部就经常用盛开的莲花来装饰。在彭山一座崖墓中,莲花苞和莲花是作为一种吉祥图案被雕刻在墓室入口和崖墓内石棺的前部(唐长寿1993:97)。的确,即使在今天莲花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农产品,它同样也是描述农业场景的画像砖中常见的植物之一^[12]。莲花与水相关是很显然的,然而在巫山县出土的一鎏金铜牌饰却显示出其与天堂的某种关联(图三)(重庆1998)。在这个圆牌饰的表面,莲花苞(也可能是瓜)明显的悬挂在两阙之间,而且正好在一个人的头顶^[13]。如上所述,巫山县也出土有相类似的鎏金铜牌饰,而在这些例子中,阙之

间的部分在榜题中被称作“天门”或通往天堂的门(图四)。

天堂和藻井的这种关联在东汉时期王延寿(公元163年)的一篇赋中体现的比较明显。在他的《鲁灵光殿赋》中,王延寿认为分层的藻井构成天窗。王写到(《文选·鲁灵光殿赋》;文物170[11.18a]翻译Knechtges1987:271, 102-109):^[14]

尔乃悬栋结阿,
天窗绮疏。
圆渊方井,
反植荷蕖。
发秀吐荣,
菡萏披敷。
绿房紫葍,
窈咤垂珠,

藻井作为一种建筑结构,正如其对墓室的装饰一样,也使得鲁灵光殿熠熠生辉。无论是墓葬还是宫殿中的藻井,都可以看作是“天井”,它一方面可以让阳光照进来,同时还使人们得以透过天窗看到远方的天堂^[15]。

除了错综复杂的建筑构件外,三台崖墓还会在墓壁仿木结构木板墙或编壁墙的壁板上雕刻一些浅浮雕画像。这些画像的尺寸都不大,但总的来说对构图的处理是连贯一致的。通常一个壁板内只雕刻一个人物或形象,当然偶尔也会看到几个形象。这种构图形式与我们看到的许多成都地区的画像砖不一样,与乐山附近一些崖墓画像雕刻也有所不同,乐山墓中所描述的人物都是在参



图三 巫山北新城出土的鎏金铜牌饰
(引自重庆1998年,图1.1)



图四 巫山县鎏金铜牌饰(引自重庆1998,图4.1)

与某种活动,被布置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中。在这些场景中,建筑的轮廓线或池塘的岸均用斜线描绘,暗示了一种从近至远的消逝。这种构图在三台崖墓画像中极为少见。这种处理方式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这样解释,成都地区的画像都是雕刻或者模铸的,先在墓室外完成雕刻然后再组装,而三台地区的画像则是直接就原岩一体凿成的。另一种解释,如 Michèle Pirazzoli-t Serstevens 认为,这种差异是受中国其它地区尤其是河南地区的影响^[16]。一个很有可比性的例子是西汉晚期或王莽时期在南阳唐河发现的一个墓葬。这个砖石墓的墙被分成了多个壁板,多数的壁板上只雕刻一个图案。

三台崖墓画像雕刻与四川其他地区崖墓画像雕刻的另外一个差异是雕刻中缺乏细节的表现。比较典型的是,三台的许多浮雕只有轮廓线,但是有些浮雕表面还保存有颜料残片。所以很可能这些浮雕的细部刻画主要运用彩绘来表现,而不像其他地区的石刻画像运用复杂的细节雕琢。

说到画像,三台崖墓画像石刻以中国较流行的题材为特色,尤其是那些与死者灵魂有关的仪式、长生不老的神仙题材、西王母等。金钟山的长笛独奏者和鼓楼山的舞者可能代表了死者灵祭仪式中的乐队或舞蹈团队。另一个例子,同样在金钟山的这一个墓中刻画了两人在玩六博,这两人很可能是常常与西王母玩六博的神仙,这在四川其他地区雕刻更细致的画像中可以见到。紫荆湾1号墓中,有个手持长杵舂臼的人,也许在为西王母调制能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这些画像并非一组宏伟的全局性构图的一部分,而似乎是从一系列与死者生前及身后生活相关的题材中挑选出来。

历史题材的场景仅有一例,而且和其他题材相比构图显得非常简化。此画像是金钟山1号墓出土的,它描绘的是“荆轲刺秦王”(《史记·刺客列传》86,2527f)。这个场景因其在山东的祠堂、四川许多地区包括江安的墓壁和石棺中多次出现而家喻户晓^[17]。在三台的画像中,仅刻画了圆柱上的匕首和秦王一手指向立柱,这样一个简单的场面就代表了整个事件的描述。这个场景的设计者并没有描绘在整个事件中充当引诱物的燕督亢之地图和樊於期之首级,而是在画像下方

雕刻了一只难以解读的巨大乌龟。

我的初步研究显示,三台崖墓中的许多题材都具有吉祥和辟邪之意。这类型题材中最有趣的是西王母题材的流行。在四川其他地区或中国其他地区,与神仙有关的象征物往往不出现在崖墓内壁和棺材上。而与此不同的是,三台以及彭山和绵阳地区的崖墓中,西王母头饰中的“胜”经常出现在门楣或棺盖边缘^[18]。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芦山一石棺侧面的画像中就有这个形象,一个神仙站在门口,胜被雕刻在楣梁上。这种图案是通过对比分析戴“胜”的西王母画像来识别的。比如,新都出土的一画像砖和荣经县出土的石棺侧面就表现了神仙所戴“胜”的基本形制。在山东武梁祠中多次刻画了西王母形象,但其中一个天花镶板上仅刻画了她所戴的胜。这个天花上还雕刻了一系列其他的祥瑞。在画像旁被破坏的碑文写道:“……胜:王者……则出。”巫鸿(1989:79)指出,《宋书》(刘宋王朝的历史)中有类似碑文场景的记载,“金胜,国平盗贼,四夷宾服则出。”^[19]虽然当时的文献均未记载它在墓葬中的功能,我们也可以推断,在三台附近“胜”象征了西王母及其所代表的好运和长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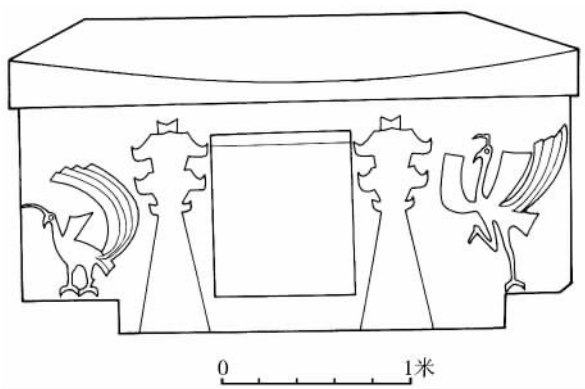
三台及邻近地区的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画像是熊,通常呈蹲坐状。元宝山2号墓中,一只正面蹲坐状的熊,其姿势像是上肢向上支撑着前室墓壁上的额枋。彭山双江镇3号崖墓中,在前室入口的门楣上雕凿了一只类似的熊^[20]。熊处于门楣的中心位置,雄性生殖器显得非常突出而且呈勃起状态。它蹲坐在臀部而不是四肢上,这使得它更具人的特性。这种画像一般释作方士或方相氏,他们是打鬼驱疫的凶神,身披熊皮、领导四时驱魔和墓室的打鬼辟邪(Bobbe1975:75-85)。熊的形象在随葬品也有发现,比如在三台的灯座和四川省外贵州北部及陕西南部发现的摇钱树干上^[21]。一般而言,正面蹲坐的熊(有时有外露的生殖器)被视作强劲的驱邪形象,其功能是保护墓葬免受侵害^[22]。关于这类形象在门楣上的应用,东汉文学家王充在《论衡》中提到过(《论衡》“订鬼”《论衡校释》22:939和“乱龙”《论衡校释》16:699;Forke1962:卷1:243和卷2:352-353;Bodde译1975:128-129)^[23]。他说道,“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

同时解释道,“以御凶魅”^[24]。

这些墓葬也有对神话人物的描述,包括那些象征天上星宿的形象:南朱雀、北玄武、东青龙、西白虎(孙华、郑定理、何志国 1998: 362,图 17-19)。另一个奇异的画像是头部相连的三鱼图,在金钟山 2 号墓石棺上发现的,其雕刻的位置跟四川其他地方的一样。比如,在合江这种题材的画像和其他神灵异兽包括蟾蜍、玉兔、九尾狐、三足鸟及一只飞雀一起雕刻在石棺的侧板上。这些神灵异兽都与西王母形象有关,与此相类似,三鱼图可能也有它特殊的涵义。一般说来,它是个寓意吉祥的形象。在山东武梁祠的一组祥瑞图中就有相关的形象,它出现在天井上,被称作“比目鱼”(巫鸿 1989: 75、242)。石刻的其他部分刻着“比目鱼王者德及幽隐则见”(巫鸿译 1989: 243)。武梁祠的比目鱼形象与四川的有所不同。然而,最近在山东省南部微山县出土的一座年代不明的石碑上就有和四川地区一模一样的连首鱼画像,更为重要的是在河南登封的一座阙塔表面也发现了同样的画像,塔叫“太室阙”,年代为公元 118 年,与三台崖墓墓壁上的画像组合不同,这种“连目鱼”是跟其它题材的画像分开刻在不同的壁板中的。河南和四川地区这种画像的相似性可能是由了解这种题材的工匠传播的。

像“太室阙”这样的阙塔是一个墓地入口的标志,同时也可以保护墓地。四川也有石阙,有的现在仍然可见(重庆 1992)。三台崖墓墓室内的石阙都是仿木结构的。浮雕的小阙塔在四川的墓葬中相当常见。三台崖墓中,单阙或双阙一般出现在墓葬入口或是墓葬中墓室的入口。元宝山 2 号墓中,两墓室间的墙上浮雕一单阙,阙塔表面仍残留有色彩(景竹友 1997)。在石棺的表面也发现过这种题材,如洞子排 1 号墓石棺的正面雕刻了双阙,双阙两侧各立朱雀一只(图五)(杨存贵、钟治 2000: 1)。这种组合题材在汉代的丧葬艺术中非常普遍^[25]。

另一类画像则显示了对墓葬的守护作用,包括门吏、兵兰、持弩武士。坟台嘴 1 号墓前室雕刻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墓门两侧雕刻有门吏。一为正面立像,但是破坏相当严重。另一为侧身形象,但是头左转,双眼注视主过厅,身体



图五 洞子排一号墓连岩画像石棺

戏剧性的前倾,肩部扛棒。在其左前方,雕刻有带斗拱的仿木立柱承托着屋顶。其中以立柱为架,搁放兵器。两柱之间雕刻着一人双足踏弓、双手持弦,其左侧为三鱼图。三鱼呈“Y”字形布局,头部均靠向中央的圆形乳突,跟前面提到的祥瑞画像一样几乎连在了一起。对面的墙壁则被典型的仿木结构墙壁构架分割成了一块块的壁板。其中一块壁板刻着一个人坐在石块或是凳子上,两腿张开,另一块壁板上则是一个站立的人。另一个画像难以辨认,很可能是个挥袖的舞者。对面墙上的手持弓弩形象,在四川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常见。兵兰也比较普遍,把它放在墓葬入口的位置,其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另外,那两人的姿势相当奇特。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公元前 3 世纪的简牍或许可以帮助解释为何一个前倾一个双腿张开而坐。由 Donald Harper 翻译的简牍中讲到制服鬼怪妖神的各种方术。开篇讲道:诘咎,鬼害民罔行,为民不羊(祥),告如诘之,召道(导)令民毋丽(罹)凶央(殃),鬼之所恶,彼屈卧箕坐,连行奇立。

墓口肩部扛棒的人似乎就是采用的最后一个姿势“奇立”^[26]。这个呈“奇立”姿势的人有可能只是简单的对经过他身边的高等级人物表示敬意,但是我们再找不到一例有如此戏剧性弯腰姿势的侍卫。鉴于它在墓中的位置,这种防御性姿势是比较合适的^[27]。睡虎地简牍中提到的另外一个姿势“箕坐”,Harper (1985: 484) 是这样解释的“通过双腿张开并充分伸展的坐姿来模仿中国箕宿的形状”。这个双腿张开的人物画像虽然

腿没有完全的伸展开,但其坐姿仍像箕宿。“连行”这个姿势很可能是通过三鱼连首的形式来表达的。尽管在这里最后一个姿势“屈卧”没有得到表现,但在绵阳一阙塔上的人物正是这种防卫性(in this protective)的姿势,在阙塔第二层至顶层的中间区域的两拱之间雕刻了一人侧卧并蜷膝以支撑身体。在坟台嘴1号墓中,各种驱鬼姿势的人物再加上持弓弩武士以及各种兵器,这种布置显示了一种保护死者的强大力量。

三、郪江柏林坡1号墓

最后需要提到的一座崖墓是尚未完全发掘的柏林坡1号墓(钟治2000:4)。在准备发掘的过程中,三台县文物管理所一直期待有专项经费的投入来保护墓室中的壁画。在这个墓内发现了一些三台地区最典型的仿木结构建筑形式,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其后室的中心立柱(都柱)和柱顶斗拱都饰红彩。虽然中室的主厅顶部部分坍塌,但是墓室其他部分,如后室及中室的侧室,都有保存完好的彩绘太阳和月亮形象的藻井。至于墓壁的装饰,由于其下部仍被泥土覆盖,因此对于画像我们暂时无法给出一个完整的解释。不过,柏林坡1号墓的发现无疑会改变我们对三台崖墓装饰的认识。

在墓壁装饰方面,此墓有两个非常有趣之处,其中之一是后室。后室右侧壁及分隔后室与中室的墓壁表面都有彩绘的浮雕。浮雕后彩绘的仿木结构木板墙或编壁墙的墙面呈一个个的方形壁板。其中一个壁板上浮雕一只跃立的猫科或犬科动物(报告释成白虎),全身涂朱色,现在仍然光鲜夺目。带斗拱结构的立柱将后室的右侧壁垂直分开,壁穿则将其水平分隔。立柱右侧有三块壁板,左侧有两块,这些壁板被安排在上下两个区域。下层壁板上雕刻了各种各样的画像,其中保存最好的是用墨线勾勒细部的青龙^[28]。侧壁的上层刻有人物画像。最有趣的是其中三块壁板上均刻有两个人物。调查者认为这三个壁板上的画像应该是一组连续的图画。第一幅图,谈情;第二幅,相邀;第三幅,合气。虽然这一组图没有新都陶砖上的生动形象,但很明显二者主题是相同或者相近的(Bagley2001293)。

秘戏图在四川地区比中国其他地区都要常

见,但是它们确切的含义仍是一个谜。关于这三幅秘戏组合图,年代在公元前168年的湖南马王堆3号墓中出土的“合阴阳”一文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Donald Harper 翻译并注释了其中两篇,《合阴阳》和《天下至道谈》(Harper1987)。Harper(1987:539)提到“除了气息调节、柔软性运动和饮食之外,合阴阳也是养生之道之一”。接着他解释了(1987:581)这种文献的需要:“这种更多的是为身体考虑而不是欲望的结果的合阴阳,必须很仔细的控制,这样双方就不至于因为技术错误而失败。两性交合方法的第一步是把微妙的性爱和复杂的性交活动转换为一种类似培育活动的技术,引导实践者走向成功。”文中写到第一步是前戏,即按照一种特定的顺序轻抚女性身体的各个部位。在中途才发生交合。这种程序的类似结果在后室彩绘的秘戏画像场景有所显示。另一些性爱题材但不是男女交媾的画像在荣经的石棺和乐山麻浩一崖墓门楣上均有发现(俞伟超2000a:7,图版9)^[29]。似乎所有这些画像的含义都是吉利的,是与长生不老有关的养生之道之一。

柏林坡1号墓中室的右侧壁及分隔中室与前室和后室的墙上均有彩绘浮雕。这些墓壁上都雕有仿木结构木板墙或编壁墙的壁板,下层壁板上浮雕有优雅舞动的仙鹤和一个杂技演员或舞者,壁板的上层则使用软笔(毛笔)在石壁上直接绘有站立人物图。这些人物都是以极其细致的手法表现,反映了传统中国画的特色。调查者已经对每个人物的名字进行了解读^[30]。这些人物都站在动物的背上,其中有一人手持一物,调查者认为这些是正驾乘飞禽的升仙人物。

分隔后室和中室的窄墙底部,彩绘有一只张嘴瞪眼的白虎。白虎代表西方,但似乎在这里,白虎所传达的意思只是简单的驱除不祥之物。白虎尾部上翘触至图画上层更复杂画像的底部。这是一幅宴享图,宴享人物坐在一白色卧榻上,前面摆着红漆几案。顶部绘有红色幔帐保护他们,说明这是他们的领地。中间一人处于其他两人之后,这种人物布局也能显示出空间概念的存在,这种场景在四川其他地区也很流行。比如,彭山的一块画像砖也刻画了相类似的一群人物。人物所坐的卧榻的边缘及其上部的几案充分的定义了

他们所占据的空间。宴享图可能与召唤死者灵魂的仪式有关,或者它们只是代表了希望死者生后仍然能够延续的美好生活场景之一。

柏林坡1号墓的彩绘浮雕和壁画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该墓以及三台县其他崖墓的浮雕显示,由于彩绘的保存明显的改变了浮雕的原始面貌。彩绘和墨线的增加,使得浮雕及同类的建筑元素,看起来完全不同于其他地区那些仅仅保留了石质表面的浮雕。柏林坡1号墓的壁画显示,有时候仿木结构墓壁的壁板上可能布满了壁画,但是这些壁画只有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得以保存。同时很显然这个墓葬的画像运用了多种浮雕雕刻技法和构图方式,所以尽管有的壁板仅布置了相当简单的单幅浮雕,但是在同一墓葬中,也运用了更加复杂的设定了相对空间位置的人物组图。

另外,关于这些画像和壁画的最终解读还有待墓葬各个部分更加完全的发掘以及具体照相资料的发表。然而,柏林坡1号墓墓葬形制和彩绘壁画、画像石刻的意外保存下来,加上前面提到的最近发现的一系列三台地区崖墓的证据展示了东汉时期三台地区崖墓原始面貌的一个诱人前景。

致谢:

我非常感谢一些曾经对我2001年春季的三台崖墓研究工作提供过帮助的四川学者,尤其是钟治和三台文物管理研究所的杨存贵。钟治陪我察看了这些遗址,同时也赠送给我他的文章(三台2002),还提供了《四川三台元宝山崖墓清理简报》的手稿复印件。杨存贵很慷慨的让我重印了文中有关墓葬的照片。同时我也很感谢陈德安(四川省考古所)和孙华(北京大学)帮助我同三台建立联系,安排了彭山崖墓的参观,以同三台崖墓进行对比研究。苏荣誉(中国科学院自然历史研究所)陪同我观看了所有的遗址,同时帮我做了这些墓葬的记录。另外我还要感谢Ellen Johnston Laing和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在此文写作过程中提出各种建议。最后我还要感谢密歇根大学地理资料图书馆的GIS专家Chad Weinberg帮此文制图。

参考书目:

Baber, E. Colborne (1882).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Supplementary Papers (London: John Murray) 1, part 1, 129-139.

Bagley, Robert (ed.) (2001). 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Seattle and Princeton: Seattle Art Museum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dford, O. H. (1937). "Han Dynasty Cave Tombs in West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26, no. 4 (April 1937): 175-176

Bishop, Carl W. (1916). "The Expedition to the Far East." The Museum Journa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7, no. 2 (June 1916): 97-124

Bodde, Derk (1975). Festivals in Classical China: New Year and Other Annual Observance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206BC-AD2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常任侠(编者)(1988)《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 18: 画像石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Chaves, Jonathan (1968). "A Painted Han Tomb at Loyang." Artibus Asiae 30, no. 1: 5-27.

陈默溪、牟应杭、陈恒安(1959)《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85-103页。

成都1981: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四川成都曾家包东汉画像砖石墓》,《文物》1981年第10期:25-32页。

重庆1992: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文物出版社1992年。

重庆1998: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第12期:77-86页。

Edwards, Richard (1954). "The Cave Reliefs at Ma Hao," parts one and two. Artibus Asiae 17, No. 1: 5-28; and no. 2: 103-29

Ericson, Susan N. (1994). "Money Tree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66: 7-115

范小平(1998)《四川汉代题材画像研究》,《东南文化》1998年第4期:78-85页。

冯云鹏(1821)《金石索》

Forke, Alfred (翻译)(1962).《论衡》卷一、卷二。New York: Paragon Book Gallery

甘肃1974: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87-109页。

甘肃1985: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

Goldin, Paul R. (2001). "The motif of the woman in the doorway and related image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funerary ar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1 (4): 539-548

龚廷万、龚玉、戴嘉陵(1998)《巴蜀汉代画像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顾森(1997)《中国汉画图典》,浙江电影出版社1997年

Harper, Donald(1985). "A Chinese Demonography of the Third Century B.C."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5: 459-498.

Harper, Donald(1987). "The Sexual Arts of Ancient of Ancient China as Described in a Manuscripts of the Second Century B.C."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 539-593

Harper, Donald(1998). *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Medical Manuscripts*.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Hayashi, Minao 林已奈夫(1987). "XX (The symbolism of the lotus in ancient China)." 《东方学报》59: 1-62.

何志国(1988)《四川绵阳河边东汉崖墓》,《考古》1988年第3期219-226。

何志国(1991)《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3期1-8页。

河北200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古代墓葬壁画》,文物出版社2000年。

河南1964: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107-125页。

河南199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黄崇华(1989)《中江汉画像石遗存初考》,《四川文物》1989年第4期18-19页。

黄明兰、郭引强(编著)(1996)《洛阳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96年。

湖北199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水库郧县淹没区考古调查》,《江汉考古》1996年第2期20-33页。

湖南1981: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常德东汉墓》,《考古学集刊》1981年158-176页。

纪南城1975: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1-8页、22页。

景竹友(1993)《三台新德乡东汉崖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68-69页。

景竹友(1997)《三台永明乡崖墓调查简报》,《四川文物》1997年第1期63-71页。

Knechtges, David R.(1982). 《文选》卷一: Rhapsodies on Metropolises and Capita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nechtges, David R.(1987). 《文选》卷二: Rhapsodies on Sacrifices, Hunting, Travel, Sightseeing, Palaces and Halls,

Rivers and Sea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uhn, Dieter(1996). *A Place for the Dead: An Archaeological Documentary on Graves and Tombs of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Heidelberg: Ed. Forum.

Laing, Ellen(1978). "Patterns and Problems in Later Chinese Tomb Decoratio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16, 1/2: 3-20.

Lim, Lucy(ed.)(1987). *Stories of China's Past: Han Dynasty Pictorial Tomb Reliefs and Archaeological Objects from Sichuan Prov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n Francisco: The Chinese Culture Foundation of San Francisco.

刘志远(1958)《成都天迴山崖墓清理记》,《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87-103页。

罗二虎(1988a)《三台县郪江崖墓初探》,《四川文物》1988年第4期67-72页。

罗二虎(1988b)《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133-167页。

罗二虎(1998)《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年第12期63-70页。

洛阳1985:洛阳博物馆《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壁画墓》,《文物资料丛刊》(1985年)163-173。

洛阳1992: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偃师县新莽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12期1-8页。

洛阳199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5期1-16页。

Mathieu, Rémi(1983). *Étude sur la mythologie et l'ethnologie de la Chine ancienn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绵阳2000:绵阳博物馆《绵阳博物馆馆藏文物》,《四川文物》2000年第6期。

南京1957:南京博物院《昌黎水库汉墓群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2期29-40页。

南京1981a: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81年第2期137-150。

南京1981b: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郭家山东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2月1-7页。

南京1991: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南京1993:南京博物院《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文物出版社1993年。

南阳1982: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5-11页。

内江1991:内江市文管所、简阳县文化馆《四川简阳县鬼头山东汉崖墓》,《文物》1991年第3期20-25页。

Nylan, Michael(2001). "The Legacies of the Chengdu

Plain.” In Robert Bagley(ed.)2001:309-325.

Pirazzoli-t'Serstevens,Michèle (2001). “Sichuan in the Warring States and Han Periods.” In Robert Bagley(ed.)2001:39-57.

Powers,Martin (1983). “A Late Western Han Tomb near Yangzhou and Related Problems.” *Oriental Art*29:275-290.

Rawson,Jessica (ed.) (1996a).*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 New Discoveries from the Early Dynasties*.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

Rawson,Jessica (1996b). “Change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ife and the Afterlife as Illustrated by the Contents of Tombs of the T'ang and Sung Periods.” In Maswell K.Hearn and Judith G.Smith (eds.),*Arts of the Sung and Yuan*,pp.23-43.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Rawson,Jessica (2001). “Tombs and Tomb Furnishings of the Eastern Han Period (AD25-220).” In Robert Bagley (ed.) 2001:253-267.

Rhie,Matylin Martin (1999).*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vol.1.Leiden:Brill.

三台 (2002):三台县文化体育局、三台县文物管理所《四川三台郪江崖墓群年度清理简报》,《文物》2002年第1期16-41页。

Ségalen,Victor(1915). “Premier exposé des résultats archéologiques obtenus dans la Chine occidentale par la mission Gibert de Voisins,Jean Lartigue et Victor Ségalen,” part 1:La sculpture sur pierre dans la Chine antique;and part2:Les tombes de falaises de Sseu-tch'ouan.*JournalAsiatique*,11.5:467-486;and 11.6:282-306.

Ségalen,Victor(1917). “Recent Discoveries in Ancient Chinese Sculptur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48:145-162.

Ségalen,Victor,Auguste Gilbert de Voisins,and Jean Lartigue (1923).*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Chine,atlas*,vol.1:La sculpture et les monuments funéraires.Paris:Paul Geuthner.

山东 1975:山东省博物馆、苍山县文化馆《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考古》1975年第2期124~134页。

四川 1956: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新繁清白乡东汉画像砖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36~44页。

四川 1975:四川省博物馆、郫县文化馆《四川郫县东汉砖墓的石棺画像》,《考古》1979年第6期495~503页。

四川 1985: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图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49~95页。

Stein,RolfA.(1990).*The World in Miniature:Container Gar-*

dens and Dwellings in Far Eastern Religious Though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宿白 (1957) 《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1957年。

孙华《三台郪江崖墓所见汉代建筑形象述略》,《四川文物》1991年第5期10~16页。

郑定理、何志国 (1998) 《三台郪江崖墓》,《四川考古报告集》350~381页,文物出版社 1998年。

孙作云 (1977) 《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考释》,《文物》1977年第6期17~22页。

Sun Zuoyun (1979) . “An Analysis of the Western Han Murals in the Luoyang Tomb of Bu Qianqu.” *Trans.of Sun Zuoyun*1977 by Suzanne Cahill.*Chinese Studies in Archeology* 1,no.2 (Fall 1979) : 44-78

唐长寿 (1993) 《乐山崖墓和彭山崖墓》,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3年。

Tjan Tjoe Som(Trans.)(1952).*Po Hu T'ung:The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in the White Tiger Hall*.Leiden:E.J.Brill.

Torrance,T.(1910). “Burial Customs in Sz-chuan.”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41:57-75.

Torrance,T.(1930-31). “Notes on the Cave Tombs and Ancient Burial Mounds of Western Szechua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4:88-96.

Uehara Kazu 上原和 (1994) . “Kōguri kaiga no Nihon-e oyoboshita eikyō” 高句麗絵画の日本へ及ぼした影響(The influence of Koguryo painting on Japan .Relations among china ,Korea ,and Japan in ancient times ,viewed from the expression of lotus designs).*Bukkyō geijutsu 仏教芸術* 215:74-103.

王启鹏、王孔智 (1989) 《中江县玉桂乡东汉崖墓调查简报》,《四川文物》1989年第5期64~66页。

王寿芝 (1987) 《城固出土的汉代桃都》,《文博》1987年第6期91~92页。

王庭福、李一洪 (1995) 《合江张家沟二号崖墓画像石棺发掘简报》,《四川文物》1995年第5期65~66页。

微山 2000: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微山县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2000年第10期68~73页。

Wu Hung(巫鸿)(1989).*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u Hung (1995)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u Hung (2000) . “Mapping Early Taoist Art:The Visual Culture of Wudoumi Dao.” In Stephen Little(ed.),*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pp.77-93. Chicago: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信立祥 (2000) 《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0 年。

杨存贵、钟治 (2000) 《三台调查汉晋崖墓群文物遗存》，《中国文物报》2000 年 8 月 23 日第 1 版。

扬州 1980：扬州博物馆、邗江县文化馆《扬州邗江县胡场汉墓》，《文物》1980 年第 3 期 1~10 页。

扬州 1988：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 101 号西汉墓》，《文物》1988 年第 2 期 19~43 页。

俞伟超 (2000) 《中国画像石全集：卷七：四川画像石》，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0 年。

俞伟超 (2000) 《长江三峡文物存真》，重庆出版社 2000 年。

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 (1956) 《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

赵殿增、袁曙光 (1991) 《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研究》，《东南文化》1991 年第 5 期 55~61 页。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1996) 《河南荥阳荥村汉代壁画墓调查》，《文物》1996 年第 3 期 18~27 页。

钟坚 (1987) 《四川芦山出土汉代石刻楼房》，《文物》1987 年第 10 期 95 页。

钟治 (2000) 《汉代繁华一穴中》，《中国文物报》2000 年 11 月 29 日“月末鉴赏”第四版。

钟治 (手稿) 《四川三台元宝山崖墓清理简报》。

参考文献：

- 《白虎通疏证》陈立 中华 1994 年
《论衡较释》黄晖 中华 1990 年
《山海经校注》袁珂 上海古籍 1980
《史记》司马迁 中华书局 1959 年 (新版 1985 年)
《文选》影印 1810 年，中华书局 1977 年

注释：

[1] 更早的西汉的木结构墓室中也发现过木结构元素。虽然这种墓最基本的构架如同一个盒子，但是它具备与生活宅第相关的小门和小窗，如湖北荆州凤凰山西汉早期的墓葬 (168 号墓) 以及江苏省邗江姚庄的西汉晚期墓 (101 号墓)。见济南 1975；扬州 1988：图 2、4；扬州 1980：图 1。

[2] 巫鸿，与罗二虎一样，认为“这些崖墓中发现的这种炉子，不论是象征性的还是实用性的，都是用来炼仙丹妙药的——这是一种又一次的把这些墓葬与道教相联系的解释。”见巫鸿 2000：84 页。

[3] 六朝墓，见甘肃 1985：图版 59.2，河南禹县十一世纪末的白沙宋墓，宿白，1957，图版 28-29。墓壁或石棺上有这种题材的宋墓的索引见 Kuhn 1996：50，注释 30。Kuhn 提到，中国

的考古学家把这种题材与宋代文献中提到的“儿媳尽孝道的观念”相关。亦可参见 Laing 1978：13-14 和 17-18 页，Rawson 1996b：35-36，44 页。另一种解释可参考 Goldin 2001。

[4] 渠县发现一个阙的表面也有同样的浮雕。见重庆 1992：149 图 232

[5] 湖南一座墓葬中出土的房屋模型 (高 36 厘米) 从外观上描述了这种屋顶。见湖南 1981：图 17.1。

[6] 在郫县的一个石棺表面也有类似的日月组合的图案 (四川 1979)。在棺材的一端，刻画了日神和月神，中间有一只展翅的飞鸟。而三台元宝山的这个墓中则把展翅的飞鸟刻画在日、月之下。

[7] 烧沟 61 号汉墓中有相似的处理 (黄明兰、郭引强 1996：87-100 页)。此墓的主室被支撑门楣及三角檐饰的立柱分割。与四川许多墓葬一样，三角檐饰的后侧 (也就是正对着后壁) 雕刻了一扇微开的门。也可参考河南 1964 和 Chaves 1968。另外一个相关的西汉墓在浅井头，见黄和郭 1996：77-86；洛阳 1993。

[8] 此房屋模型 (#99) 出自 5 号墓，是此墓中多个房屋模型之一。另一个房屋模型的瓜是挂在斗拱下立柱的顶端。文章的作者认为此墓的年代在汉代以后，但是其他的一些资料显示其年代在东汉末期 (俞伟超 2000 年：70)。另外还有一个这样的房屋模型 (高 62 厘米) 是在遂宁县发现的，年代为东汉 (Lim 1987：139，图版 46，彩版 7)。

[9] 《山海经校注》，卷 1，65 页；见 Mathieu (1983，卷 1：130) “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叶如橘，其实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瘕，可以御火。”

[10] 其他有关的墓葬在山东和江苏地区，但是年代均在汉以后 (山东 1975：图 1；南京 1981b)。南京郊区的一座东晋墓中发现过一个类似的石制品 (直径 11.2 厘米，高 7.7 厘米)。发掘者并不清楚其用途，但是其外形与四川的瓜类似，分八瓣，底部有类似茎的把手。

[11] 甘肃雷台，见甘肃 1974：图版 2.3；河南打虎亭见河南 1993：图 159-160，图版 6-9。打虎亭 2 号墓天花中央有彩绘垂莲。这些天花板交替装饰着美轮美奂的藻井和装饰性的窗户。在沂南 (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 1956：图版 18.1-2) 荷花的中央微微裂开。南京 1981a 图 5 也有一个藻井装饰着类似盛开的花朵。

Marilyn Rhie (1999) 也探讨了汉代藻井和汉以后佛教造像中类似的藻井之间的关系。她在 66 页中提到，Uchida Kazu (1994) 把方形藻井莲花与早期汉代宫殿建筑联系起来。Uchida 把汉代文献中有这些被称作藻井的部分都列举了出来。在这方面，也可以参看 Hayashi Minao 关于中国先佛教时代 (the pre-Buddhist China) 莲花的经典文章 (Hyashi 1987)。

[12] 遂宁出土的池塘模型 (51 × 31.5 厘米)，见 Rawson 1996a：214，图版 116；刘志远 1958：图版 4.1

[13] 另一个鎏金铜牌饰 (重庆 1998：78；图 1.2) 上，在一塔的一侧刻画了一个花朵和一个悬挂的花蕾。而牌饰的另一侧一只老虎出现在柱子一旁。

[14] 何晏《景福殿赋》中提到了类似的藻井 (《文选·景福

殿赋》文物 175 [11.27a]) Knechtges 1987: 289, .150-155

[15] Rolf Stein (1990: 147-155) 研究过汉和汉以后佛教流行时期的这种藻井, 他提到“藻井中水的象征物的存在应该是用于防火。”他认为天窗与中溜(霤)有关。他认为这可能与五家神及对其崇拜有关。东汉《白虎通》中, 五祀是指祭门神、户神、井神、土地神、中雷(《白虎通·五祀》;《白虎通疏证》, 2.77; Tjan Tjoe Som 1952: 卷.2: 376f)。也可参见王充的《论衡·祀义》;《论衡校释》25.1049; 翻译 Forke 1962: 卷 1: 510; Bodde 1975: 51.

[16] Michèle Pirazzoli-t Serstevens (2001: 52-53) 指出, 从风格的角度看, “四川的石刻与河南南部南阳的艺术风格是比较相似的, 很有可能南阳的雕刻家或是设计者在四川雕刻艺术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她还提醒人们注意南阳雕刻中“留白较多的疏朗构图”。

[17] 这个话题的相关讨论见 Nylan 2001: 323f. 亦可参看龚廷万、龚玉、戴嘉陵 1998: 图 241-244 河南石刻 (272×45 厘米); 乐山 Mahao 墓壁石雕 (376×63); 江安一号墓石棺雕刻 (221×66); 渠县阙塔石雕 (123×35)

[18] 巫鸿 (2000: 79) 提到了彭山和乐山墓葬入口的胜的形制, 并且把它与五斗米教相联系。唐长寿 1993: 62, fig.18, 提到了胜的多种造型。

[19] 巫鸿 (1989: 79 页) 同时引了应劭《风俗通》的一段话, 今本中已佚, “(七月七日) 以七种菜为羹; 剪綵为人, 或镂金薄为人, 以贴屏风, 亦戴之头鬓; 又造华胜, 像瑞图金胜之形” (详细书目, 见巫鸿: 355, n.12)。

[20] 在绵阳周边最近发掘的一座崖墓中, 墓室后壁中央雕刻了一只阴茎勃起的熊。资料尚未发布。

[21] 我在一篇早期的文章 (Erickson 1994: 25) 中提到 (根据发掘简报的提法), 这些形象可能是猴, 但根据我在 2001 年 5 月通过对一手材料的观察发现它们应该是熊。罗二虎 (1998: 图 3-4) 也把它们视为熊, 另外, 他认为摇钱树上最顶端的中心形象为佛像, 而之前被认为是个女性形象。

[22] 这种熊的形象可能有助于我们对经常被视为佛像的蹲坐形象的释读, 二者常处于同一的位置。在邻县绵阳出土了一棵摇钱树, 树干上有几个塑像, 跟有熊的树风格一致 (何志国 1991: 图 19 和 20, 图版 1.1 和 1.2)。另外贵州清镇也发现了类似的摇钱树树干上有塑像 (陈默溪, 溪牟应杭陈恒安 1959: 图 10.5); 重庆忠县 (赵殿会、袁曙光 1991: 图 1、2); 湖北郧县 (湖北 1996: 图 6.3)。彭山 166 号墓中出土的摇钱树同样有佛像饰于其表 (南京 1991: 图 44)。另外, 乐山麻浩 9 号崖墓墓室主廊道的一门廊上雕刻了一蹲坐的形象 (南京 1993: 159, 彩版 1; 高 37 厘米)。另外一个蹲坐的佛像同样是在乐山马号狮子湾附近一号墓中发现的 (南京 1993: 彩版 2)。它们是中国最早的佛像之一, 这并非是没有意义的。但因为它们出现在墓葬和摇钱树树干上, 可能说明它们与佛教崇拜关系甚小。它们可能只是像蹲坐的熊及西王母的胜一样, 是一种强劲的辟邪物。

[23] 马王堆 3 号墓中出土的医学书籍《五十二病方》中记载桃人是可以治疗男子疝气的。Donald Harper (1998: 302) 对这段文字进行了翻译: “禹步三, 取桃东枝, 中别为回回之倡而门户上各一”

[24] 这类画像中还有一个形象是一个人脸的正面形象充满了整个壁板, 在紫荆湾 1 号墓及松林嘴 1 号墓中都有发现。绵阳市附近的最近才发掘的一个墓的后壁上发现了一个相似的人脸, 但这个人脸有外伸的舌头。其驱邪的功能是很显而易见的, 可能跟镇墓俑一类的陶塑类似。(成都附近的一例, 见 Bagley 2001: 307, 118; 高 89 厘米)

[25] 一个西汉的例子见扬州胡场 1 号墓, Powers 1983: 图 8-9. 这个盒子似墓室的其中一块木壁板上就以这种装饰为特色。

[26] 另外一个“奇立”人物是在金钟山 1 号墓 (孙华、郑定理、何志国 1998: 图 6)。

[27] Harper (1985: 488) 也提到: “墓口位置奇立这种防御性姿势可能与古代萨满教舞步中的跛行和单腿跳有关。禹步是萨满教的一种经典步法: 一般这样的, 一腿托于后, 另一腿向前迈步。”

[28] 其他题材包括白虎, 兔, 悬挂在最顶端壁板上的怪兽 (可能是猴), 另外一只动物站在最底端的壁板上。

[29] 彭山 550 号崖墓中也有男女交媾画像 (俞伟超 2000a: 18, 图版 21 [高 49])。

[30] 另一些东汉晚期墓葬中壁画除了画像外还有题字。河北望都 1 号墓 (河北 2000: 29-56), 题榜就在人物的旁边。河南郑州东汉晚期墓葬见郑州 1996。